

ifva

同你一齊講故事



ifva節目貫穿全年，去年舉辦的講故事活動好評如潮，今年再與林紀陶合作，策劃新一輪節目。

影像背後都有初衷，在日益泛濫的資訊包圍下，要回到最初、追溯創作者的創作動機並不容易。著名編劇兼影評人林紀陶受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節之邀，從過去十八屆的得獎作品中，挑選多部短片，重溫多位創作人拍片的心路歷程，他們最初到底為甚麼會拍片？又如何去說好一個故事？

文：香港文匯報記者 伍麗微 圖：部分由主辦方提供

第十九屆 ifva 節開展在即，重頭戲當然是「短片及錄像比賽」，互動媒體組、公開組、動畫組及青少年組是孕育本地創作人才的溫床，而亞洲新力量組則吸引來自內地、台灣、馬來西亞、新加坡、伊朗、韓國、日本等地區的參賽者，競爭十分激烈。觀乎過去十八屆的得獎者，如今不少仍從事創意媒體工作，有些甚至成為導演、動畫家，ifva 對他們來說，或許是作品曝光的一個平台，或許是促使他們去創作的一個動力，也可能是第一個作品面世的機緣。曾多次擔任 ifva 評審的林紀陶便說，ifva 是獨立電影的溫床，同時也培養了一批人才，他們活躍於廣告、設計、動畫、電影等行業。

尋找故事源頭

林紀陶此次一共挑選了十七部短片，其中八部是 ifva 開幕節目「我們一起愛自主」的影片。「從這麼多影片中挑選，讓我很頭痛，最後選出這八部，都很有代表性。」八部影片中，有第一屆金獎得主崔允信的《長途電話》，第二屆動畫組得獎者袁建滔的《球迷奇遇記》，許誠毅的《爛喇先生》，麥曦茵的《他·她》，麥婉欣的《了了》，游靜的《我餓》，彭浩翔的《暑期作業》等。

林紀陶說：「每個人都有自己的故事，故事變成作品中間會有一個過程。」這八部作品的創作者都已經從實驗拍片走向專業創作者，如今再去重溫短片，可以找到他們拍片的初衷，與拍攝風格的轉變。

「麥曦茵、游靜、卓韻芝之前拍獨立電影起家，現在都去拍商業電影。你看《他·她》，裡面有很多意象，畫面很乾淨，去到商業片，則更有自己的想法。」創作者的拍攝風格，在獨立電影裡更加明顯，像《長途電話》，



黃修平將舉辦工作坊，教大家講故事。

是崔允信的第一個作品。「他很難得，1995年才拿獎。」之後他遊走於獨立和主流之間，拍了《三條窄路》、《憂憂愁愁的走了》、《追蹤眼前人》、《愛情萬歲》等片，又成立「影意志」，如今再看《長途電話》，彷彿回到崔允信最純粹的狀態。又如《球迷奇遇記》、《爛喇先生》這兩部動畫片，林紀陶形容創作者袁建滔與許誠毅是「香港卡通發展史的關鍵人物」，兩人後來投身動畫界。袁建滔將「麥嘜」搬上熒幕，又參與製作《長江七號》；許誠毅則成為《史力加》動畫的設計師，對本地動畫發展影響甚深。「香港動畫好勁、好活潑。」

拍片的關鍵就是如何去講故事，如何把故事拍出來。那故事的源頭又在哪裡？短片《暑期作業》，則間接地道出彭浩翔拍電影的心路歷程。「彭浩翔為甚麼會拍片？原來是因為交不到功課。在《暑期作業》裡，你可以看見他心裡對電影有潛在的愛好，也解釋了他為甚麼會喜歡電影、會拍電影。」

精彩影片大放送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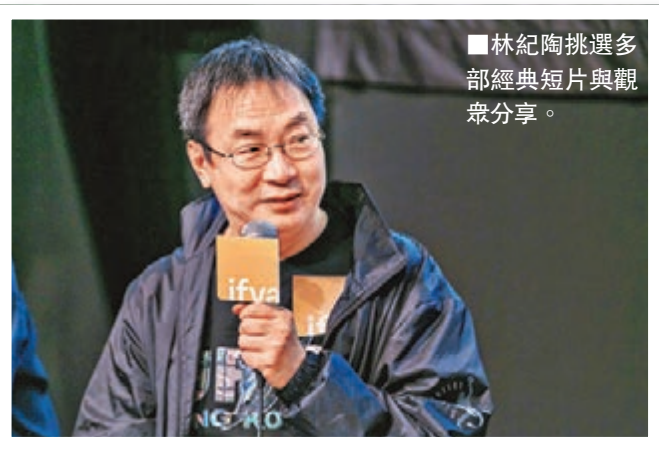
開幕電影以外，林紀陶又策劃「ifva 同你講故仔」系列作品選，精挑九部富香港特色的獨立電影，回味精彩時刻。其中許舒雅《阿明》、甘文輝《關公月下斬貂蟬》、盧海鷹的《香港仔》非常過癮，反映了香港創作人的技藝與創作狀態。

昔日 ifva 得獎者黃修平，去年憑《狂舞派》人氣急升，這次他也被 ifva「拉落水」，舉辦工作坊，教大家「講故仔」。修平笑

說：「我喜歡教東西，姑且班門弄斧教一下。」而他挑選他最愛的一部作品——岩井俊二的《煙花》，連同他之前的三部短片一同放映。



如何講故事，如何將故事轉化為影像，是 ifva 欲帶出的思考。



林紀陶挑選多部經典短片與觀眾分享。

ifva 獨立短片及影像媒體節將於3月13日至23日舉行，屆時將有更多節目放送，各個獎項也隨即揭曉。你有心水未？



(左起) 康文署電影節經理馮欣兒、香港藝術中心總幹事林潔儀、編劇林紀陶、媒體藝術發展策展人連蕙理及 ifva 總監鄺鳳詩一同介紹今屆 ifva 活動。



文：余綺平

鐵托的藍色列車

前南斯拉夫已故總統鐵托擁有的私人豪華「藍色列車」，荒廢了三十二年，經過翻修，最近重新啟動，行走於塞爾維亞與黑山之間，成為火車「發燒友」的最新旅遊熱點。

「藍色列車」建於1947年，車內設施富麗堂皇，鐵托經常乘坐它往歐洲各國訪問。他曾在火車上接待過英女皇、法國前總統密特朗、前蘇聯領導人勃列日涅夫、印度首任總理尼赫魯、利比亞前領袖卡達菲、巴勒斯坦解放組織前領袖阿拉法、羅馬尼亞前總統齊奧塞斯庫等。

鐵托於1980年逝世，靈柩也是由「藍色列車」運回首都貝爾格萊德下葬。從此，藍車被棄置在郊外的車廠裡。

經過多年翻修，藍車重現上世紀六十年代的光輝歲月，例如，二十四張耀眼的紅皮椅子，圍繞着長長的會議桌擺放；華麗的睡房、客廳、會議室、衛生間和放映室。藍車懷舊和優雅的豪華設備，讓乘客重溫鐵托的強人歷史。

自鐵托逝世後，南斯拉夫種族問題愈加嚴重，內戰爆發，國家分裂。2003年南斯拉夫改名為塞爾維亞。

英國媒體近日廣泛報道「藍色列車」恢復行走的路線：從塞爾維亞首都貝爾格萊德，前往黑山共和國的海岸城市巴爾(Bar)。此路線於1976年完工，並花了23年時間興建，犧牲了104條人命。路線全長295英里，列車穿越254條隧道，經過435條橋樑，包括全歐洲最高的山谷架橋 Mala Rijeka，沿途可以「欣賞」到翻滾的激流和令人眩暈的峽谷。

《獨立報》記者乘坐「藍色列車」後的報道文章形容，剛恢復的線路行程驚心動魄，因軌道破舊失修(1999年曾遭北約軍隊擲彈炸斷)，沿途需要停車搶修，經常誤點。但記者認為這些不足之處，反而是火車旅程中最神秘的處。

去年《每日郵報》推薦的全球十大最壯觀的火車旅程中，正包括了由塞爾維亞開往黑山這一段路線。

「藍色列車」是鐵托建築於火車軌道上的皇宮。上世紀六十至七十年代，訪問過貝爾格萊德的各國領導人，曾經都是藍車的座上客。

至於南斯拉夫與中國的關係，中間卻與蘇聯扯上關係，有太多積怨。據《人民網》去年四月一篇分析「1977年鐵托訪華的台前幕後」的文章指出，中國和南國之間「有太多說不清道不明的是是非非」。兩黨關係曾中斷近二十年，中國對南共聯肯定性為修正主義，「文革」期間中國對南國的批判更升級為謾罵羞辱。

文章透露，直到1975年毛澤東接見南國總理比耶迪奇時揚揚鐵托說：「Tito，中文是鐵托，鐵托就是iron……不怕蘇聯壓迫。」文章認為，毛澤東對鐵托的評價，為鐵托兩年後的訪華鋪開道路，兩國始恢復關係。

鐵托訪華時，85歲的他還登上長城當了好漢。

乘坐鐵托的「藍色列車」，正好可以進一步認識中國和南國之間的「一筆幾十年的老賬」。鐵托雖然「不怕蘇聯壓迫」，但1971年勃列日涅夫訪南、坐過「藍色列車」後，南蘇關係恢復正常；相反，中蘇關係惡化，由論戰發展至武裝衝突。

「藍色列車」六日行程，收費899英鎊，詳情可瀏覽 www.montenegroholiday.com。

村上春樹回應小鎮抗議

日本知名作家村上春樹在短篇小說中提到北海道中頓別町的民眾丟煙蒂是很稀鬆平常的事，小鎮鎮民感覺受辱，提出質問。村上今天回應說，發行單行本時將修改地名。

村上去年12月於月刊雜誌《文藝春秋》發表的短篇小說《Drive My Car》(暫譯《開我的車》)描述到「男主角心想，或許中頓別町的民眾這樣丟煙蒂是很稀鬆平常的事」，引起中頓別町居民不滿，他們透過出版社提出質問。

村上早前透過出版社回應說，因對北海道有親近感，也覺得「中頓別」這地名聽起來蠻好聽的，所以才寫在文中，造成中頓別町民眾不快的話，他感到很遺憾，這短篇小說在發行單行本時，地名將作修改。

小說寫到，一名女司機從駕駛座車窗丟出點着火的煙蒂，讓男主角認為或許中頓別町的民眾這樣丟煙蒂是很稀鬆平常的事。但中頓別町議會的民代認為，中頓別町9成面積是森林，民眾防火意識很高。

中頓別町位於北海道旭川市北方約130公里，是人口約1900人的山間小鎮。明治時期靠着淘沙金，小鎮有一番榮景。人口巔峰期在1950年，約有7600人，但隨着林業衰退以及1989年鐵路JR天北線停駛之後，人口銳減。

中央社

探「書」的價值與閱讀的本質 ——記2014台北國際書展

每年的台北國際書展總是在冬末春初時舉辦，台北的冬天濕冷、初春仍乍暖還寒，往年擠進書展會場就像是從春寒的街頭進了暖房，不僅展攤林立、琳琅滿目的彩艷書封襯着聲色喧嘩更顯熱鬧，萬頭鑽動的人潮總讓人摩肩擦踵、寸步難行。出版社大打折扣戰、作者簽書座談會以爭取開春以來第一季的業績，來自國際的版權代理交易也摩拳擦掌地從海外拉來各式書樣。台北國際書展既是第一線的書籍販售現場，也是國際出版交流的平台，參展單位數目與觀展人次分據市場的不同面向，卻同樣關鍵。除此之外，會場內特展的設置、書展大獎的評選，也經常成為出版市場多元性的指標，它作為台灣出版產業開拓除了販售業績之外的可能面向。

今年一走進會場，書展現場與往年相比似乎稍顯清寥，海內外參展出版社數目為648家，相較去年的730餘家、前年超過800家的數量，略有消退；不過根據主辦單位台北書展基金會的數字，在國際版權上則相對蓬勃，近500場的版權會議數高過去年的384場。這似乎也間接說明台灣目前出版的一個面向：在書籍市場的銷售端，已有海外其他市場銷售作為參考的版權翻譯書的能見度總是高過本地自製書；一方面當然有促進國際閱讀交流的作用，然而另一方面其壓倒性的能見度是否也

揭露了在地書籍企劃、自製潛力及厚度的隱憂，足以讓人深思。

在今年的台北國際書展中，印刷業者加入攤群、則展示出一個相對新鮮的角落；以「印象森林」為名，在以樹為意象的展場空間中展出了各式視覺藝術書籍雜誌及印刷品。在受到電子書逐漸普及的壓力下，印刷品質與書籍裝幀設計的追求，已經成為紙本出版物在市場上必然出現的市場區別策略，因此將印刷這個總是在出版中相對幕後的環節拉上舞台，確實對紙本出版有着正向作用；然而這項看似美意的心思，若與台北書展基金會在今年取消了「金蝶獎」的評選相對應來看，又令人感覺略為違和且不明所以。自2004年由台北書展基金會創辦的「金蝶獎」是台灣唯一針對書籍設計所設置的獎項，不僅評選出台灣年度優秀的書籍設計作品，同時得獎作品也將由書展基金會提報、代表台灣參加德國「全世界最美麗的書」獎項評選；近兩年，台灣的書籍設計作品也在該獎項中獲得銅獎、銀獎等獎項，不得不說是極具突破的結果，然而台北書展基金會卻就這些獲獎經驗，以「已完成階段性任務」作為理由而停辦2014年的金蝶獎。

書籍設計作為出版的一個面向，這兩三年來在台灣也

逐漸提高能見度，已經不止於停留在設計、藝術類型書圈裡，在文學類型、人文類型的書上也已經看見出版社對書籍設計的重視與封面設計品質的提升，在這樣的時間點取消「金蝶獎」，究竟對台灣書籍出版在方向上帶來甚麼樣的訊息，尚需要觀察。

不過今年在層層銷售展攤之間，由國家圖書館策劃的「寄給時間的漂流季」明信片展，則讓人眼睛一亮；由國家圖書館的館藏文獻中，選出約兩百餘張包含原件與復刻片的明信片，展品年代主要集中於1920年代至1940年代初期，不僅看得見近百年前台灣觀光行銷的意向，也可以瞥見早期庶民生活文化與都市風華。另外由台灣文學館策劃的「時間的封印，文學的聲音——重要古物與珍品圖書特展」也相當值得一看，不僅展出十九、二十世紀投入台灣文化運動的台灣知識分子及文人如洪棄生、楊逵、張深切等人的手稿，也展出對台灣文學極具重要性的各式經典古本，如周夢蝶於1959年在台北藍星社出版的第一本詩集《孤獨國》，或是由台灣評論社出版的楊逵《新聞配達夫》一書。



書展現場，前方為日本書區。



印刷業者展位「印象森林」。

這些已歷數十年、近百年前的出版品、手稿與書籍，皆置於展場的玻璃櫃中，當然已經成為僅能遠觀、無從閱讀的藏品；對應着書展現場熱烈銷售的嶄新書籍，不禁也讓人思索「書籍」作為載體所承載的閱讀本質，在跨越時間的洗禮後如何轉變；今年已然落幕的台北國際書展，超過五十萬人次的入場數字相較去年略少，卻仍使人對台灣的閱讀能量有所期待，至於這樣的能量能夠如何投注在出版產業中轉化成效，則是未來值得持續注目的議題。

文、圖：劉佳曼